

宁夏社会科学院 西夏学译丛 景永时 ◆ 主编
圣雪绒西夏研究院

E·И·克恰诺夫 聂鸿音 著

西夏文

《孔子和坛记》研究

XIXIAWEN KONGZI HE TANJI YANJIU

民族出版社



Е·И·克恰诺夫 聂鸿音 著

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研究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研究/(俄罗斯)克恰诺夫,聂鸿音著;
崔红芬,文志勇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

(西夏学译丛)

ISBN 978 - 7 - 105 - 09944 - 3

I. 西… II. ①克…②聂…③崔…④文… III. 西夏语—
道家—文献—研究 IV. 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52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b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32 千字

印数: 0001 - 1500 册 定价: 1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944 - 3/B · 401 (汉 16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24782

目 录

《孔子和坛记》读后(代序)

聂鸿音 (一)

未知的孔子与道人的谈话录

克恰诺夫著 崔红芬、文志勇译 (七)

原书影印、直译与意译

聂鸿音 (四三)

《孔子和坛记》读后（代序）

星基干中照某事乃文件辭由新舊 卷一 聂鸿音 麻豆五「卷一」 山星从乃文照斗土照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西夏學家聂历山曾在俄國的黑水城特藏里找到過一本題為「孔子和坛記」的書，原書用西夏文寫成，是某種已失傳的漢文道家著作的西夏文譯本^{二一}。從那以後，人們再沒有聽到這本書的消息，迄今的各種西夏文獻目錄也都失載。直到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四，克恰諾夫才在該研究所的寫本部重新發現了它，並在《東方寫卷》雜誌上撰文介紹^三，兩年後又將其全部整理出版。克恰諾夫的研究著作也叫《孔子和坛記》^三，全書分五個子部分，導言題為「未知的孔子與道人的談話錄」，其後依次是《孔子和坛記》的俄譯文、注釋、詞語

表以及西夏文原书影印件。

西夏文《孔子和坛记》一九〇九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现编号HNB. No. 3781。原书写本蝴蝶装，佚卷首，其余部分已从版口处断裂，共得七十二枚单叶，每叶五行，每行八至十字不等。卷尾题「孔子和坛记一卷终」（精麤麤麤麤，并有残损漫漶的年款一行，克恰诺夫教授根据尚可识别的「寅四年」（𐵑𐵓𐵔𐵔）三个西夏字推测，这个写本应当写于西夏元德壬寅四年（1122），在全部黑水城文献中属于年代较早的。

我们此前已经知道，西夏人自己编写的书大都不分卷，尤其是篇幅比较小的著作，他们习惯称之为「一本」（𐵑𐵓）或「一部」（𐵑𐵔），而不称之为「一卷」。《孔子和坛记》既然在卷尾题有「一卷」字样，就说明这部书应该不是西夏人自己的作品，而是基于中原某种汉文书籍的译著，卷尾的「孔子和坛记一卷终」也是从汉文原书上照译下来的。

西夏文《孔子和坛记》记载的是孔子、子路和「老人」的一次谈话，主体部分是持道家观念的「老人」对孔子的为人处世方法和儒家学说的批评，以孔子服输告终。下面试译现存的前四叶，以见谈话的缘起：

……须发斑白。来自东方，行道迟迟。言若大儒，茕茕趋坛。子路见彼老人同来，恐至孔子面前，扰其乐歌，乃徐徐逆之，欲使老人他往。老人□□□见道

本「旁一树，树下一石，乃坐其上，独自歌之，独自舞之，旁若无人。子路至于树侧，品望老人拜手稽首，曰：『老夫高年皓首，出游既无子孙相随，又无拄杖之用，奈最本何去家独行郊野，茕茕而来此耶？』」《庄子》更不似《渔父》。《庄子》不大在把《孔子和坛记》全部译成俄文之后，克恰诺夫教授就着手寻找西夏人据以翻译的汉文原本，可是他查遍了秦汉典籍中有关孔子和子路的记载，都没有见到作为《孔子和坛记》原本的文字，比较起来最为相近的只有《庄子》的第三十二篇，也就是《渔父》。他认为《孔子和坛记》和《庄子·渔父》的相似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部著作中都出现「老人」、孔子和子路三个人物（「老人」相当于渔父）；第二，两部著作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都表现了道家对儒家学说的批评。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不但《渔父》中的子贡这个人物在《孔子和坛记》里并未出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渔父》和《孔子和坛记》中完全相同的话连一段也没有。在他著作的第二十八页至第三十页上，克恰诺夫教授已经把两部书中哪怕是一星半点相似的部分都译成俄文排列了出来，这使我们确信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事实上，只要认定《孔子和坛记》和《渔父》多少有些关系，我们就可以对西夏文书题中的「和坛」两个字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渔父》的开头说：

孔子游乎缙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成玄英疏：『中云高丘也。其状若杏，即之杏坛也。』

故奏之。十卷平俗神之林 朴坐平俗社多土 琴子新种 凡十种 琴 琴曲 木半

《曲》由此可以知道，「孔子和坛记」的「坛」指杏坛，「和」指琴。至于「渔父」这个人物，成玄英说：

出来。《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讫，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泛海至齐，号曰鸱夷子；至鲁，号曰白□先生；至陶，号曰朱公。晦迹韬光，随时变化，仍遗大夫种书云。

这段讲疏令人感到多少有些荒诞，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感觉，克恰诺夫教授倾向于把「渔父」认作老子，这不但有《史记》作为佐证，而且还大致与西夏文的「老人」相契合。他的判断无疑是可以信从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许还可以进一步猜测，《孔子 and 坛记》应该是后代道家传人在《庄子·渔父》启发下杜撰的书，其汉文原本产生的时间不会早于晋代。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征引来看，人们开始为《庄子》作注都是魏晋玄学盛行之后的事情，而在汉代，《庄子》一书似乎不那么受人重视，人们自然也不大可能以它为基础去写自己的书。另外，假如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的「和」字真是本于「琴者，和也」这则故训的话，那么我们便不妨设想它是唐代成玄英以后的作品。当然，这个设想一时还很难成为定论，因为魏晋隋唐诸代虽有过多种《庄子》注本，但除郭象注外均已亡佚，我们无法查证「琴者，和也」这则故训是成玄英自拟还

是从旧注本中因袭下来的。

道教在西夏的流行虽然不及佛教，但也算是小有规模。西夏政府中设有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功德司」，在法典中也严格规定了出家当道士的条件和手续^{〔四〕}，与《孔子和坛记》一道出土的黑水城文献也有《吕观文进庄子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等道家著作^{〔五〕}，前者在中国文献学界已久享盛名。我们感谢克恰诺夫教授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闻的道家新书并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他的著作将对中国文献史和西夏文化史的研究起到有益的推动作用。

注释：

- 〔一〕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ё фонды" (1935),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Ки. 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87.
- 〔二〕 E. I. Kuchanov, "The "Altai Rescued on Confucius' Conciliation, an Unknown Tangut Arostural Work",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4, No. 3, 1998.
- 〔三〕 E. И. Кычанов, *Запись у алтарно примир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0.

- 〔四〕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八—二八四页。
- 〔五〕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西夏天盛律令》，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八—二八四页。

〔五〕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王克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〇

〔四〕史金波、白滨《西夏天盛朝令》，中国敦煌吐蕃文献集第四甲编卷五册，转学出

版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0.

〔三〕Е. Н. Крыж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тибетском буддийском канон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рбодария Моск.,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4, No. 3, 1998.

〔二〕Е. Г. Касьянов, The "Vijaya" recorded on Copperplate, Concision, in: Sukhmani Tantri, Dolma, K. I. Moscow: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0, с. 87.

〔一〕Н. А. Перский, "Тибетская Пис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1932), Тибетская фило-
主釋

麻西夏文外史附錄卷五益西雜記

朱界鼎刊了一條前朝末兩首家藏并批訂了赫澤西蘭釋，此首并抄收中國文編史
卷《華蓋卷》^{〔三〕}，前首在中國文編學界已入草堂藏各，其口想爾克爾爾夫瑪瑪又氏等
味法^{〔四〕}一首出土西黑水城文編史首《呂藏文批五子文》、《太土師玄冥金天尊前慈普
散釋事表前》^{〔五〕}，查此典中出西前藏五子出家出前土師桑并味手發^{〔六〕}，已《五子
前釋五西夏前論詩》雖然不又神釋，但出實最小首財藏，西夏題詞中教育寺口管照
景从印到本中因發不來西。

未知的孔子与道人的谈话录

E. N. 克恰诺夫著 崔红芬 文志勇译

这篇极为罕见的西夏文作品是聂历山 (H. P. 涅夫斯基)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从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掘带回的文献藏品中发现并刊布的。聂历山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西夏文写本及其典藏》中写道：「西夏党项人在他们的作品当中，糅和了儒家、道家等多种思想，我们在部分语录体作品中发现了大量的老子、庄子、列子和淮南子的论述。除此以外，还找到了一些翻译成西夏文的伪经，这些作品宣扬道家高于儒家的思想，并将孔子和他的门徒子路描写得行为举止十分可笑。但是，这类作品在西夏文藏品中数量极少，《孔子和坛记》即是其中之一。」^①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聂历山并未将其列入清册目录，一九五九年笔者接手对黑水城藏品中的西夏文部分继续进行编目造册时，仓促间竟未能找到这部作品。一九六〇年我终于找到了它并将其列入清册目录，编号为第3781号，其后正式编目为西夏特藏第426号（*HHB. No 3781*）。

该书为蝴蝶装写本，规格为宽七点五厘米、高十三点五厘米，共计七十二叶，每叶五行，每行八至十个字。无边栏。蝴蝶装叶面的天地很窄，白口留在中间，即将页面依中心折叶，装订成书脊。通常在刻本或是据刻本复抄的蝴蝶装书籍中都留有这样的书口。书写字体为偏斜的楷体。全书很可能并非一人所抄，我们发现，不同叶面的笔体有一些差别，例如线条的粗细，但这也许是改换书写工具所造成的。用纸为灰色的薄纸，质量较差。书叶边缘已有卷边、折角甚至是破损，使得阅读翻叶较为困难。

卷首缺失，卷尾重复标题《孔子和坛记》一卷。书籍保存不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修复室曾对此书进行过修复。修复时将书籍拆开过，它原来的装订已被破坏。在第二十七至三十四叶之间的西夏文残字片断还依稀可见。我无法将这些残片缀合、识读。因此，这些残断的内容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西夏文学作品中的年款问题：

按西夏文写本书籍的惯例，卷尾的最后一行可能会标明作品完成的年代。识读年

代一般都比较困难。我对此书题记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突破。题记年款中的最后一个字较为容易识读，意思为「完毕」，这就是说此文抄写或翻译完成于某个时候。接下来第二、三个字的意思为「五日」，就是说文章完成于那一天。按惯例来说，标准的西夏文年款中，上面所述日期的前面两个字应该是月份。但遗憾的是我未能判定它。第四个字当中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原有的，而是修复该作品时把从书中别的地方上掉下来的残字粘到了此处。

标明月份的字的前面（表中第五、六个字）应该是年份，可以解读为「四年」。那么由此可见，该行题记中的前四个字应当是年号和此年号内的第四个干支年。这四个字中第二个字的右半部分对识读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的意思也比较清楚可靠。剩下的就是选择年号，有三个年号可供选择：

元德 一一九一一二六年

应天 一一〇六一二〇九年

光定 一一一一二三年

以上年号中的第四年应该分别是一一二二年、一二〇九年和一二一四年。该作品抄写或翻译刊行的年代即是以上三个年头中的一个。我只能从解读此年号的干支年份入手。从上面第四个字保留下来的右半部分推测，这是用草体书写的寅年。以上三个年号中属于寅年的为一一二二年（一二〇九年为巳年，一二一四年为戌年）。为了保证

选择的正确性，还应当确保所选之年在六十甲子中的排序也是与寅年相配的某个字。由此，借助以上第三个字的右半部分可以确定该年完整的干支，这样组合成的年份是六十甲子中的第三十九个。令我万分惊喜的是，一二二二正好是甲子纪年中的第三十九年。这样的话，写本的成书年代就可以确定为一一二二年。但现在很难说这就是写本抄写或翻译完成的时间。抄者或译者未署真名，仅题名为「归心者」，难免使读者怀疑，作者可能是西夏的某位道士。聂历山对该作品的研究成果，保留入档的仅有两页内容和几页西夏文原文抄件，抄件上，在已经识读出的西夏文字下面标有汉字。聂历山当时就非常正确地断定，该作品是汉文作品的译作，包含了对儒家思想的抨击和批判，但至今未能找到汉文底本，大概已经失传了。

该作品的西夏文题目比较复杂，确切翻译这个题目还有一定的难度。「坛」和「记」这两个字在题目中彼此间没有什么语法联系，最简单的词组搭配就是译成「坛记」。如我们已经确定的那样，此书是以《庄子》第三十一章《渔父》的内容为主线展开的。

《庄子》是一部由多篇文章组成的多角度作品集。《渔父》一篇在汉朝司马迁时代就被当成是寓言体作品，收入庄子的作品目录中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庄子时这样写道：「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篋》，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①在《渔父》当中，孔子和渔父是在坛旁相遇的。按中国学者的注疏，「坛」字有两种解释：一个，泽

中之高处，即水泽湖泊中的一块高地，上面长着很多的杏树，所以叫「杏坛」；二、为祭祀而修建的一种建筑物，叫「杏坛」^四。聂历山的译名《孔子和坛记》，我认为不太妥贴，因为文中的意思并非如此。这个「坛」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地点，「坛」与「记」组合起来不能译成《坛记》，因为无论是汉文本还是西夏文本，都没有说此文是在坛上所作。事件发生在坛旁，汉文叫「杏坛」。我建议翻译为「坛旁」。西夏译者明确地选择了「坛」的意思是「为祭祀修建的建筑物」。文中提到，孔子去追赶老人的时候，从坛边下来。因此我建议将书名翻译为《孔子坛旁折服访贤记》。

本文中描写了三位主人公：老人、孔子和孔子的学生子路。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我相信大家对这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会感到陌生。近年来俄罗斯又相继出版了两部介绍孔子的学术著作^五，一部是玛里亚文的《名人传——孔子》，另一部是别列洛莫夫的《孔子：其生平、学说及遭遇》，以下我还会提到这两部著作。孔子的儒家学说有很多特点。我在此引述俄罗斯学者马尔蒂诺夫的看法，他认为儒家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孔子把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从动物世界和血缘关系中分离了出来，使之变成了「抽象的人」；

二、孔子将「抽象人文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意识中的方方面面，认为对待别人的态度不应以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高低而有所差别，应当以平等的态度，像对待自

己一样来对待别人。这也是一种仁爱的体现，这无疑孔子的一大功绩和贡献^{〔二六〕}。

事件的第二个主人公是位老人。西夏文作品中对事件的描写是以《庄子·渔父》为框架的，其中的老人对应于《庄子》中的渔父。在该作品中，老人并没有直接自称为渔父，只有一次他对孔子说：「吾郊野水边渔人耳。」

在俄文的著作当中，第一次介绍「渔父」这个形象的是阿列克谢耶夫的译作^{〔二七〕}，说的是渔父与诗人屈原相见的故事。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庄子》中的渔父就是越国的贤人范蠡^{〔二八〕}。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并灭掉了吴国，但是，他看出与越王勾践只能共苦，不可同甘，所以就离开越国去了齐国，在那里经商致富。后来他为了避祸，散尽家财，迁往陶城经商，在那里改名换姓，称为陶朱公，又重新发财致富^{〔二九〕}。范蠡的故事在《国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三〇〕}。按《国语》的说法，越王勾践对范蠡说：「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三一〕}范蠡回答说：「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三二〕}。按中国学者的注释，范蠡「平吴事讫，乃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齐，号曰鸱夷子；至鲁，号曰白圭先生；至陶，号曰朱公。晦迹韬光，随时变化。」^{〔三三〕}

另一种说法认为渔父即是越国的大夫文种（卒于公元前四七三年）^{〔三四〕}，大夫文种与范蠡一样，协助越王灭了吴国，越王勾践对他评价甚高，称他是治理国家事务的有才能的重臣^{〔三五〕}。他后来也离开了越国。

还有一种说法则干脆认为渔父就是老子易容以后的称呼。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这样写道：「《渔父》中的主要内容，从头至尾都是渔父，也就是装扮成渔父的老子，在抨击孔子到处奔波劳碌却无益于世的活动。」《庄子》中还有一个河上公也扮演了渔父的角色，这就是老子。有人认为，老子生活在前汉文帝时期，做过官（公元前一八〇—前一五七年），但据《庄子》中对老子的说明来看，他生活的时代应是公元前三世纪中期左右。」

老子是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又名聃，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官。洪氏写道：「老子姓老，后改姓为李，名聃，又名耳。称他为「子」是为了表示尊敬，意思是「君子、学者或是老师」。他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官，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曾与孔子相会过。」

第三位主人公是子路（又称仲由、由、路等，约公元前五四二—前四八〇年），鲁国卞城（今山东泗水）人，是孔子的弟子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生动地描写过子路：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豚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